责编： 兰文飞 E-mail:lanwenfei@126.com Tel:010—62806237

◆书 摘

新的认知方法

□[美] 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蒂尔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对真实与自由的关系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密尔写道，在真理与谬误的自由市场中，真理会最终胜出。假如现在密尔错了，真理不再能获胜，因为真实与虚假间的竞争不再公平，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自由不会最终胜出。但或许又像新技术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竞争比以往更公平？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民主的关键是有一个勇于报道的新闻媒体。“一旦所有新闻报道都来自二手信源，人们将失去对真理的感觉，只对观点作出反应”，他在 1920 年写道，“人们应对的环境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由新闻报道、流言和猜测构成的拟态环境。思想的整个参照系变成了某些人的断言，而不是现实情况”。广播和电视新闻的先驱爱德华·默罗曾担心准确的报道因为花费时间而经常处于劣势：“真相还在穿裤子的时候，谎言都环游世界一周了。”不过，关于技术和人性的这一看法并没有让默罗相信追求真相是徒劳的。相反，这加深了他将人类道德观贯彻于追求真相过程的信念。

近来流行一个观点：大多数人无法区分信息是否可靠，或许并不要紧，精英群体能够区分就够了。精英群体向来容易获得信息。正如杰伊·罗森曾提到的，第一批职业记者是那些被富商雇来以私人信件形式告知其他城邦市场情况的人。因此大企业购买彭博社（Bloomberg）的新闻内容，同时决定彭博社的新闻运营也能让人接受。现在，充分利用新传播技术的精英群体能获得更多信息。而掌握同样传播工具的公众，因为选择其他媒体渠道而不看新闻，或者沉溺于明星八卦而不关注公共生活，放弃了这一机会。对此，我们束手无策。技术已经彻底加快了社会分层的速度。极力劝说也改变不了人性。

21 世纪真正的信息鸿沟不是接入互联网的和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人群之间的差距。它是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和只会肯定先入之见、固步自封、不再学习的人之间的差距。这是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新鸿沟。新闻素养成为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

假如我们更多地以集体讨论而不是演讲的方式来了解公共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是，这种新的讨论有得亦有失。更深刻、更多样化的新元素增加进来了，与此同时，偏见、错误和操纵也趁机而入。和任何公共讨论一样，有些发人深省，有些则不是。但这正是、并将要成为一种新的学习方法。有两种了解世界的方法：一种是基于事实的经验主义；一种以信仰为导向，会影响我们对事实内涵的意义解读。它们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尤其在最近这个阶段更加突出，因为此时新权威尚未诞生，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对于公众而言，他们被抛入到自己决定“我可以相信什么？”的过程之中，意味着新的责任和风险。对于参与搜集和报道新闻的人来说，新的或下一代新闻业意味着承担苏格拉底式的教师的新角色。在报道新闻的同时，提供素材甚至进行个别指导，培养人们将素材转变成知识的技能。

此外，我们认为，现在看到的错位和混乱的后果并非不可避免。事物原本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们只是处于当前混乱的开始阶段。学习的历史就是人类用智慧应对科学技术的历史，不同的文化应对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学习史，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有些甚至一度消失。这是一个推与拉的故事，旧模式想办法战胜新模式，有时新模式会进两步退一步，时而还会脱离正轨。

假如现在这一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自身的技能的话，那么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必须将公民素养和新闻素养再次引入中学课程。公民素养是一门告诉我们如何成为社群中合格公民的课程，超越了公民学范畴，更强调参与性、苏格拉底式的求知方式和个性化。而新闻素养是公民素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所提出的“新闻素养”不同于“媒介素养”，后者主要基于左派观点，它教授各种形式的媒介如何代表商业和既有利益操纵我们。我们所说的“新闻素养”是指如何“阅读”新闻报道的技能，即怀疑的认知方法。我们希望本书所概括的观点有助于说明这一方法。但我们不想自诩已经在本书中开创建立了这一课程，这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只是试图提出，存在着一些可被称为新闻素养的技能。我们希望已经帮读者梳理出了新闻素养的核心观念，列举了一些杰出专业人士如何操作的实例以及如何将其移植到一般应用上的范例。

一个世纪以前，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和哲学家约翰·杜威曾就人们是否有能力享有自由进行了公开辩论。关于 20 世纪商业媒体的本质方面，李普曼的论证更具说服力。他认为公众不具备成为知情公民的条件。不过他认为新闻媒体比受众也强不了多少，因此他要求精英群体为二者提炼信息。在某种意义上，20 世纪下半叶的新闻媒体试图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提供更多解释和分析。关于李普曼对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批判，杜威并无异议，但他认为李普曼把精英主义视为药方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杜威说，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唯一合理的角色是帮助教育公众，让他们更有能力参与民主社会。除此之外，新闻媒体没有其他的存在理由。教育也是如此。假如不再相信民主，那么民主就难以拯救。

一个世纪以后，技术条件已经达到了杜威的设想。教育的时机来临了。

摘自《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3 月版

◆读书方法

“反过来”读书

□郭继民

关于读书的经验之谈，历来见仁见智。不过，以愚 30 余年读书之经验，有些书（尤其人文社科方面的书），可以尝试“反过来”的读法，这样读不仅仅好玩，而且还可能发现更有意思的话题，甚至能发现文字背后的“真相”。

譬如，言及孔子、庄子，时下人们尝以“丧家的孔子”“快乐的庄子”来描述之；我们若能反过来“读”之，也许可以得出“快乐的孔子”和“失意的庄子”之结论。

确实的，大凡对孔子有所了解之人，莫不承认夫子命运之坎坷。夫子本来试图通过从政实现其伟大理想和政治抱负，不承想反遭陷害，甚至 50 多岁，还出走列国，由此开始数十年“风餐露宿”的颠簸、周游生活。

然而，若换个读法，孔子的命运似乎并不那么凄惨。相反，孔子的流浪生活甚至算得上是快乐的。当然，我们承认他流浪中确实有过不快，甚至有过诸多“生存危机”，正如弟子所言，“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庄子·让王》）。孔子着实够倒霉的，竟然在树下休息都不成，别人还以砍树的方式羞辱他、驱逐他。不过，若换个角度想想，兴许孔子的生活没有那么悲哀。想想看，一位学富五车的慈祥老者，和一群年轻才俊，坐着牛车，说说笑笑地旅行于乡间小道上，走累了，便在树下看看书，研究点学问或谈论点有意思的话题，那温馨的场面，想起来都觉得幸福。即便中间出现一点“不谐”的插曲，不也是给其弟子“动心忍性”之修炼带来某种契机吗？更何况，无论孔子走到哪里，那帮“铁杆粉丝”始终紧随身后，不离不弃，甘愿受罪，怎不让人感动。

孟子云，天下有三乐，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至少这一点，孔子享受到了。更何况，孔子这种精神上的快乐，是其他乐趣所无法比拟的。现在做老师的（尤其大学老师），也难有孔子那样的福分。且不说，课下师生形同路人，即便课堂上，师生彼此间也陌生得很。孔子及其弟子那样的师生情谊，真令我等教书匠艳羡不已。因此，就此而论，奔波列国中的孔子是快乐的，甚至带有诗意。顺便说一句，恰恰是孔子的“流浪”际遇，才造就了“千古一圣”。假若孔子顺风顺水、按部就班地从政、当官，世上兴许多了一个清正的官员，但人世间却少了一个开儒学风气之先的“圣人”。

同样，对于庄子我们亦可以“反过来”读。人们读庄子的《逍遥游》，每每认为庄子是洒脱、自由且逍遥的，是人们艳羡的对象。而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庄子的物质条件是很困顿的：靠打草鞋为生，借粮还受到监河侯的奚落；更严重的是庄子精神的困顿，庄子的朋友不多，能理解他的就更少了，唯一一个能和他谈得来的惠施有时还嫉妒他，甚至陷害他……正因为庄子生活困顿且充满羁绊、受排挤，又缺乏知己，时时处于被“羁绊”的境遇之中，所以他才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寄托”在瑰丽的想象中。换言之，大凡其书中所赞美的东西都是人世间他最缺乏的东西，且其对自由、逍遥等品质赞美的程度与其匮乏的程度大抵是成正比的。这种“张力”在《齐物论》中表现得最明显。《齐物论》的主旨就是不争辩，因为万物齐平，何辩之有？庄子追求“齐物”，尤其痛恨“争辩”，然而，《齐物论》通篇都是庄子在“辩”，看那语气，活脱脱一个义愤填膺、嫉恶如仇的“愤青”。难怪清人王先谦曾这样评价道：“……求其真宰，照以无明，游心于无穷，皆庄生最微之理想。然其为书，辩多而情激，岂真忘是非者哉！不过空存其理而已。”（王先谦《庄子集解》，三秦出版社，1998）由此看来，现实中的庄子是很难“逍遥”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庄子是“落寞”的。当然，这并不妨碍庄子的伟大。庄子的伟大，就在于其在纯然的“思想中”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完成了绝对的逍遥和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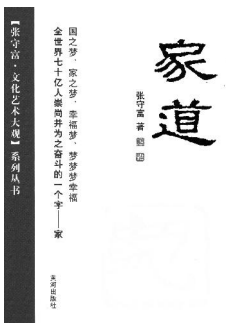
类似的，还有大诗人屈原，其笔下所赞美的“香草”“美人”诸多美好的意象恰恰与其陷身的真实丑恶现实构成强烈的对比，其理想愈美，则反证现实愈黑暗。又如，尼采、马克思等大哲学家的著作，亦大抵可作如是观。尼采的“超人”理想反衬当时“平庸”之世界，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则恰恰表现出对剥削社会的一种反叛和超越。

由此可见，“反”着读书，不但可以读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即从文本的反面去考察文本所处的时代，而且“反着读”还能读出作者的“原义”。譬如，对《道德经》稍有研究的当知，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本意是，治理国家，政策不能老变来变去，否则“鱼”（国家）就被翻烂了。问题是，老子何出此言？如果我们反过来问一下，当对历史面目认识得更为清晰。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国凡六七百，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乱作一团，很少有长治久安的。基于此，老子才发出如此之感慨。

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是说对“书”要持适当的怀疑态度；马一浮、熊十力等先生则认为读经典，贵在“清空头脑”。以上诸看法此皆有道理。然而，笔者以为，我们除了吸收上述读书法外，还要善于把书“反”着读。反着读，实质上是换个角度乃至多角度去读。“文本”本身乃是死的（当然，西方后现代主义甚至认为，“文本”乃是活的，其“活性”之大小全依仗读者的“赋意”和诠释），但文意却是“活”的。通过“多角度”的读，相信当读者可从流淌的“文意”中不但能读出一番他人少有的兴味和乐趣，而且还可能有“意外收获”甚至重大发现。

何乐而不为之？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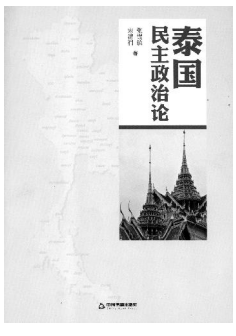
书名：《家道》
作者：张守富
出版：黄河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
推 荐 人：张 西 立（《红旗文摘》总编）

推荐语：家与国，在中国人心中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每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会将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同国家的整体命运联系在一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无比宏大同时又无比细腻的“家国情怀”，绵延千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有家才有国，万家兴则国兴。作者在书中对此有充分说明。该书辑录了作者对“家”文化多年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有家须有道，家兴万事兴”这一看似浅显实则富有深意的道理。



书名：《非典启示录》
作者：王宏甲
出 版：海 峡 书 局 2013 年 12 月

编者谈书：非典十年，有关 SARS 的书籍已出版不少，这是首部全方位系统地追踪记述 2003 年全球联手抗击 SARS 的纪实文学作品，也是首部全程追述人类与某一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斗争的纪实作品。殊为可贵还在于，作者的追踪和反思没有停留在非典事件本身，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卫生事业和非典之后出现的医患矛盾作了深入的追踪撰述。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追述追思，令人信服地写出，不能抛开卫生事业而孤立地进行医疗改革，今日中国迫切需要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卫生医疗改革。



书名：《泰国民主政治论》
作者：张锡镇 宋清润
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

编者谈书：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未被殖民过的国家，也是实施民主最早的国家，然而她却至今没有走上健康的民主化之路，仍在困境中摸索，道理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作者通过理清泰国民主思想的缘起，发展脉络，剖析各种民主思想的本质特征，对思想家们的地位作用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帮助读者了解泰国民主的思想根源。通过回顾泰国自 1932 年民主革命至今，民主政治所走过的道路和运行的轨迹，从而展现一个观察当前问题的大背景。并历史地考察宪法、议会、政府、政党、王室和军队等泰国民主机制的存在形态和运作方式，以及它们的互动关系，使读者深入观察泰国民主政治的操作层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试图勾勒出泰国可取的民主化发展路径。

◆名人读书录

借助目录学开阔读书视野

□仇 丽

著名史家陈垣（1880—1971）先生在 82 岁高龄与北师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读书经验时，总结他几十年读书治学经历，特意总结出两条：一条是“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其中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另一条则是“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两条合起来，就是有“博”，有“约”。其中“从目录学入手”的方法，更是这位读书靠自己摸索，没有老师指点，自学成才的史学大家甘苦自知的切身体会，是他的心得，值得我们重视。

陈垣出身商人之家，父亲做药材生意，因此家庭生活比较宽裕，这给他提供了读书的机会。他在一篇《跋魏建功家书》的短文里曾论及“贾人子弟，自昔为文士所轻。其能奋自磨濯者，亦多讳其所出。起家寒素，宁托之农而不愿承之商，亦中国社会一怪现象也”，这样的会意，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但他却能一心向学，13 岁就能知道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样的目录学专著。张的这本书，在近代以来的读书人中影响颇大。

当然，影响更大的是那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多少读书人就靠着读《提要》入手读书的。另一位史学大家吕思勉（1884—1957）在回忆过去读书经历时就说，他在初能读书的时候，他父亲就按当地读书人家传授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教授他去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一方法使得他这样刚上手读书的学子能够对以经史子集分类的传统学问有一个鸟瞰的了解，不至陷于固陋的村究之学。

陈垣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且读过好几遍。在熟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基础上，他还对《四库全书》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1920 年，他和助手检查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了解清楚了它的大致情况，还编辑了《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和《四库书目考异》等工具书。

他为什么那么重视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的目录学入手读书？他说：“目录学就好比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找到了。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可以较充分掌握前人研究成果。”这是他能够靠着自学而成为以渊博、掌握材料多著称的史家的重要经验。我们即便不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也完全可以从这条经验中获益，掌握点目录学的知识，经常翻阅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的目录学名著，庶几可以逐渐摆脱眼光狭隘的村究之学的嫌疑。

◆书而思

今天，我们谈谈信仰

□徐庆群

联合国原秘书长安南说，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所以，志愿精神就是理想和信念，说到底就是信仰。

那么信仰有什么用呢？安南说，就是服务、团结，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一本红军后代刘江波的《信仰的追问》告诉我们这两个字背后承载着多少追求、多少牺牲、多少梦想、多少希望。

刘江波，一个红六军团老号手的后代。拿破仑说，军号是战争的灵魂。一把小小的军号调动千军万马，像掀天揭地的巨浪扑向敌人的阵地，那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阵势，是刘江波父亲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但是在战场上，号手和旗手最容易牺牲，因为为了让更多士兵看见旗帜、听见号音，号手和旗手都必须站在最高处。所以，刘江波的父亲在长征期间曾三次负伤，每一次都命悬一线，每一次都奇迹般生还。那是因为，在长期机动作战、异常艰苦的环境里，红二、六军团上至军团长贺龙、党代表任弼时，下至师团长、营连长，总是尽一切可能把轻伤员带上。

“每一种牺牲都永恒，每一种奉献都高尚，每一座无名墓碑都应当高耸于我们的内心。”刘江波的这本《信仰的追问》不到十万字，写了一年多，由 12 篇小文章集结而成。每一篇文章，都是她沿着父亲和父辈们的足迹行走，都是她沿着父亲和父辈们的足迹追问，探寻生命的意义，考问灵魂的住所。父亲，以及像父亲一样的共产党人贺敏学、郭化若、唐凯、彭湃、陈树湘、三个女红军等等，有的人我们听过，有的人我们没有听过，都在刘江波的讲述下重新站起来了，站起来的还有他们的故事里饱蘸着的两个字——信仰。

其实，信仰多么具体，在革命战争年代，信仰就是斗争、革命、流血、牺牲，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信仰就是奋斗、改革、奉献、志愿，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努力进取。

现在，在各种文章、图书、影视剧中，我们从来不缺少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可贵的是《信仰的追问》不仅以一个红军后代的视角讲述了父辈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故事和精神，更重要的是唤起了我们心灵深处久违的信仰，以及更重要的追问。

《信仰的追问》激活了我的记忆，尽管我的记忆都来自于书本，但是合上书本，我们如何信仰呢？

贺龙元帅之女贺晓明在《信仰的追问》作品研讨会上说，信仰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陈云老前辈说，如果共产党不讲为人民服务，那么共产党就没存在的必要了，一切工作应该向为人民服务看齐，讲信仰就是要奉献，就是要助人为乐、做志愿者。

去年 12 月 5 日，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 20 周年暨第二十八个国际志愿者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肯定他们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勉励他们弘扬志愿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青年一代应该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作为自己的信仰。

《信仰的追问》，刘江波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版